

人口老龄化下我国农村养老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赵思毅

贵州大学法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城乡老龄化倒置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呈现出规模巨大、增长迅速、家庭空巢化、未富先老等典型特征。受城乡二元体制、养老模式衰退、资金供给单一、公共服务失衡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农村养老在制度建设、经济保障、运行模式、服务供给等领域陷入多重困境。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与数据分析法,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梳理农村老龄化现实特征, 从历史、主体、文化、经济四个维度剖析困境成因, 并依托多支柱养老理论、福利多元主义, 从制度完善、保障升级、资金多元、服务提质、文化赋能五个维度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 以期完善农村养老体系, 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农村养老, 养老模式, 养老保障, 乡村振兴

Practical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Rural Elderly Care in China under Population Aging

Siyi Zhao

School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17, 2026; accepted: October 1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intensifying inversion of urban-rural aging,

China's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present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 huge scale, rapid growth, empty-nest families, and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Affected by the superimposi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urban-rural dual system, the decline of elderly care models, single-channel capital supply, and imbalanced public services, rural elderly care has fallen into multiple dilemmas in the field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economic security, operation modes and service supply. This paper adopt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 sorts out the realistic features of rural aging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dilemmas from four dimensions: history, subject, culture and economy. Grounded in the multi-pillar pension theory and welfare pluralism, it puts forward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paths from five dimensions, namely system improvement, security upgrading, diversified funding, service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rural elderly car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Rural Elderly Care, Elderly Care Model, Elderly Care Secu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相较于城镇，农村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受人口迁移、家庭结构变迁、区域经济差异等因素影响，农村老龄化呈现城乡倒置、空巢化加剧、未富先老等特征，传统的养老模式已难以适配当前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农村养老保障与服务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国内学界围绕农村养老、养老制度、养老服务、资金保障等方向开展了系统性研究。陆杰华等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制度的五阶段演进历程，指出政策碎片化、城乡分治是制约农村养老发展的核心障碍[1]；杨清哲聚焦农村养老整体现状，论证了家庭养老、土地养老、集体养老逐步衰退的现实趋势[2]；郭庆旺等从传统文化与人力资本视角，阐释孝道伦理、代际互惠对家庭养老的支撑作用[3]；董克用等区分“多层次”与“多支柱”养老框架，为养老体系顶层改革提供理论依据[4]；曹献雨等运用文献计量法总结国内养老研究全貌，明确当前研究短板与未来发展趋势[5]；汪伟则从宏观经济视角，分析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对居民储蓄、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联动影响[6]；张艳霞等基于福利多元主义，剖析农村养老资金供给的结构性短板[7]。

现有研究已从不同维度拆解农村养老相关问题，但将老龄化特征、现实困境、深层成因与优化路径进行整合分析的成果仍有补充空间。本文依托上述文献成果，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数据分析法，梳理新时代农村人口老龄化特征，全面剖析农村养老现存问题与诱因，并提出可落地的优化方案。

2. 新时代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典型特征

结合曹献雨等学者对国内养老领域研究的梳理可知，农村老龄化问题是当前学界与政策层面聚焦的核心议题[5]。相较于城镇地区，农村受人口流动、产业形态、家庭结构、经济基础等多重因素影响，老龄化演化路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

2.1. 老年群体规模扩张，城乡老龄化倒置问题突出

从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化来看，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呈现绝对数量激增、占比持续走高的双重态势。陆杰华在梳理农村养老制度历史脉络时指出，城乡老龄化倒置的核心诱因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大规模人口迁移[1]。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差距促使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乡土，前往城市务工、定居。这部分群体既是农村主要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家庭养老的核心照料者与经济支持者。青壮年持续外流直接导致农村常住人口空心化，老年人口占比在被迫提升；相对应城市因不断吸纳外来青壮年人口，老龄化进程被有效稀释。这种人口流动造成的结构性差异，使得农村养老负荷远高于城市。庞大的农村老年群体叠加加速老龄化的人口趋势，让传统养老体系的承载力不断承压，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医疗服务等各类养老需求集中爆发，原有制度与服务供给难以匹配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

2.2. 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化削弱传统养老功能

家庭是我国农村延续千年的养老核心载体，而城镇化、生育观念转变、人口异地生活等多重因素，彻底重塑了农村传统家庭形态。过去我国农村以几代同堂的联合大家庭、主干家庭为主，家庭成员数量多、代际联系紧密，天然形成了内部互助的养老格局。进入新时代后，农村家庭户规模不断收缩，小型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形态，传统大家庭模式逐步瓦解。

结合郭庆旺等关于传统文化、代际互惠与家庭养老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长期依托抚育-赡养的代际契约与孝道文化维系[3]。家庭小型化与空巢化首先打破了家庭成员物理共处的基础，日常起居看护、突发疾病陪护等即时性照料服务难以实现。其次，多数外出务工青年自身面临城市生活、子女教育等多重经济压力，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给能力有限，代际经济支持随之弱化。与此同时，城乡文化交融、思想多元化不断冲击乡村传统伦理，部分农村地区孝道文化逐步淡化，年轻一代的养老观念、赡养意识发生转变。

2.3. 老年群体结构复杂，弱势群体占比偏高

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并非同质化整体，内部人口结构分化显著，高龄、失能、留守、低学历等弱势人群高度集中。从性别结构来看，农村老年女性人口数量略高于男性，结合人口寿命规律，女性高龄、失能的概率相对更高，且农村女性长期以来经济独立性偏弱，对外部养老服务与经济支持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男性。从受教育结构分析，受建国初期乡村教育资源匮乏的历史条件限制，当前农村老年群体中文盲、半文盲占比居高不下。这部分老年人不仅难以理解复杂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策条款，在数字化时代还面临严重的“数字鸿沟”，线上缴费、远程问诊、智慧养老等现代化服务均无法正常使用，政策享受、权益维护、公共服务获取都存在明显障碍。

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身体机能全面衰退，普遍伴随慢性疾病，自主行动能力大幅下降；失能、半失能老人完全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全天候专业照护，是养老需求最为刚性的群体；而农村留守老人同时兼具“空巢”与“务农”双重属性，既要维持农业生产，又要独自承担家庭琐事，身心负担沉重。这类弱势群体普遍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单一的经济保障已经无法满足基本需求，还衍生出医疗护理、康复保健、安全监护、心理疏导等一系列附加需求。老年群体的结构性失衡，意味着农村养老无法采用“一刀切”的统一模式，必须分类施策、精准供给。

2.4. 区域分布不均，未富先老矛盾显著

从全国地理空间视角划分，我国农村老龄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不均衡特征，学界普遍以胡焕庸线作为划分界限展开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一侧的东部沿海农村、河南、四川、安徽、湖南等中部劳务输出大

省，农村老龄化程度普遍处于高位；而线西北侧的西北、边疆乡村，人口外流规模较小，常住人口结构相对稳定，老龄化进程更为平缓。区域差异的本质源于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水平：东部沿海地区的本地城镇化率高，所以农村人口向城区转移明显；中部劳务输出大省青壮年常年跨省务工，乡村空心化问题突出，两大区域老龄化压力集中。而西北欠发达地区人口外出意愿较低，乡村人口结构相对稳定，养老负荷相对较轻。区域老龄化的差异化格局，导致全国统一的养老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各地养老财政负担、服务供给能力差距不断拉大。数据表明中部太和县农村基础养老金每月 132 元，村集体无分红，老人年均养老医疗支出约 4200 元，养老金仅能覆盖 37.7%基础开销[8]。

同时，未富先老是全国农村老龄化最突出的矛盾。杨清哲的研究反复强调，不同于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老龄化，先富裕、后变老”的发展路径，我国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现代化标准、乡村产业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就提前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

3. 当前农村养老发展的主要困境

3.1. 制度层面：城乡二元分割，政策碎片化严重

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这个制度是我国养老领域存在的根深蒂固制度性问题。自建国以来，我国养老制度便按照城镇、农村两套体系独立规划、分别实施，逐步形成“重城镇、轻农村”的资源分配格局。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起步早，所以保障标准高、配套政策完善；而农村养老制度长期处于补充、附属地位，顶层设计滞后，规则标准与城镇差距悬殊。这种固化的二元分割格局，从根源上造成了城乡养老权益不公，也是农村养老各类问题的制度源头[1]。

3.2. 保障层面：待遇偏低，资金供给结构失衡

经济保障是农村养老的物质基础，当前农村养老的核心支撑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该制度整体保障能力偏弱，叠加筹资模式缺陷，形成了待遇偏低、资金结构单一的困境。从养老金待遇来看，全国农村基础养老金整体标准普遍偏低，且省际、省内县域之间差距极大。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基础养老金可达数百元，而中西部欠发达县域每月标准仅一百余元，微薄的养老金仅能维持最低生存需求，无法支撑老年人正常生活、医疗开支。

结合张艳霞对农村养老资金供给的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采用“个人缴费 + 集体补助 + 政府补贴”三位一体筹资模式，但在农村落地过程中三大主体均出现不同程度缺口[7]。第一，绝大多数村庄集体经济薄弱甚至沦为“空壳村”，集体补助这一法定筹资渠道基本形同虚设；第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结合经济理性与对养老收益的顾虑，绝大多数参保农户都会选择最低缴费档次，长期低缴费直接拉低未来养老金领取水平；第三，政府补贴以普惠性基础养老金为主，针对高档次缴费的激励政策不足，难以引导村民主动提升缴费标准。与此同时，作为多层次养老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养老保险、个人养老储蓄，在农村市场渗透率极低。商业养老产品大多依托城镇收入水平设计，与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养老需求不匹配；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偏少、宣传普及不足，村民对商业保险认知度、信任度较低。整体来看，农村养老资金高度依赖各级财政，多元筹资体系未能真正建立，保障体系抗风险能力薄弱。

3.3. 模式层面：传统养老衰退，新型供给不足

长久以来，我国农村依托乡土社会特点，形成了家庭养老为核心，土地养老、集体五保养老为补充的传统养老格局[2]。

其一，家庭养老持续走弱，前文已论述家庭小型化、空巢化、代际支持弱化等问题，农村家庭已无

力承担全部养老压力；其二，土地养老功能不断衰减，耕地流转、农业收益走低，土地无法再为老年人提供稳定收入；其三，农村五保供养、集体养老机构服务范围狭窄，仅面向特困、孤寡老人，绝大多数普通农村老年人无法享受相关服务。反观新型养老模式，短板同样突出：农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站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运营”问题，设施建成后因经费、人员不足长期闲置，常态化服务难以开展；邻里互助、旅居养老等本土化新兴模式仅在部分试点乡村落地，尚未形成规模化推广态势。传统养老模式逐步瓦解，新型模式供给乏力，让农村老年人陷入无合适养老选择的困境。

3.4. 服务层面：医养衔接不畅，服务供给短板突出

养老与医疗密不可分，但当前农村“养老”与“医疗”两大服务体系相互割裂，医养结合落地困难，成为农村养老最突出的服务痛点[8]。农村基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普遍存在设备简陋、医疗器械老化、专业医护人员短缺这些问题，仅能处理感冒、发烧等简单常见病，慢性病规范化管理、术后康复、长期失能照护、安宁疗护等专业服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农村老人一旦罹患重病或需要长期护理，只能远赴城区医院，就医成本高、陪护难度大。例如，丰都县保合镇卫生院现有在职职工 33 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30 人，无专职康复技师、护理人员配置不足；村卫生室无长期照护床位，失能老人需赴县城就医养老医疗负担沉重¹。

尽管国家先后推出“养中有医”“医中有养”“医养签约合作”等多种落地模式，但在农村地区受资金、资质、人才三大壁垒制约，推进效果极差。农村养老站点、敬老院无力增设医疗科室，也难以取得医疗执业许可；基层难以吸引专业护理、康复人才扎根；运营资金短缺也让医养服务无法常态化运转。

4. 农村养老困境的深层成因

4.1. 历史体制成因：城乡二元结构遗留弊端

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这些养老问题的本质。建国初期，我国逐步建立起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公共财政、医疗资源、养老设施等优质公共资源长期向城市倾斜[1]。数十年的发展差距逐步累积，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制度建设形成大量历史欠账。即便近年来国家持续出台政策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但长期形成的资源配置惯性、制度壁垒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城乡养老待遇、服务水平、制度规则的差距依然显著，区域发展失衡、养老不公等问题持续存在，从体制上制约了农村养老事业的良性发展。

4.2. 主体成因：多元供给主体发育不足

当前农村场景下，各类主体均存在明显短板，协同机制完全失效。第一，政府层面：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重硬件建设、轻运营服务，同时监管考核、动态评估机制缺失，政策落地效果大打折扣；第二，市场层面：农村养老行业投入大、盈利慢、风险高，民间资本、商业保险机构观望情绪浓厚，市场活力不足；第三，社会组织层面：农村本土养老类公益组织、志愿服务团队数量少、规模小，且大多依附于基层行政体系，独立性、服务能力不足，难以承接专业养老服务；第四，集体经济层面：大量乡村集体经济萎缩、空壳化，无资金、无资源支撑本村养老事业；第五，家庭层面：人口外流、经济压力、结构变迁多重影响下，家庭养老能力持续弱化。

4.3. 文化成因：传统养老文化逐步弱化

郭庆旺的研究指出，以孝道、代际互惠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家庭养老存续千年的文化根基[3]。

¹https://www.cqfd.gov.cn/sy_200/ztzl/sydwjdjgggs/sydwndbggs/2025/202606/t20260618_15763933.html

一方面,青壮年常年在外出务工,与农村老人物理距离遥远,代际日常交流、情感互动大幅减少,传统孝道观念的传播与传承失去载体;另一方面,城市现代思想持续涌入乡村,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养老观念发生转变,部分群体赡养意识淡化。代际之间的“抚育-赡养”隐性契约约束力下降,家庭养老的文化纽带持续松弛。文化根基的弱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非正式养老体系的危机。

4.4. 经济成因：农村经济基础薄弱

经济基础决定养老保障能力,这也是农村养老所有困境的底层诱因[2]。当前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单一,经营性收入(务农)占比最高,财产性收入、资产收益占比极低,整体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老人自我养老能力不足。同时,城镇化推进、耕地流转使得传统土地养老功能持续衰退,农业生产的低收益无法为老年人提供稳定保障。

5. 农村养老体系优化路径

5.1. 制度优化：破除二元壁垒，完善顶层设计

首先,在国家养老法治框架下完善地方配套制度。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²,由县级民政部门整合分散在乡村振兴、社保、卫健领域的涉老政策,出台县域农村养老服务专项实施方案,补齐政策碎片化短板。其次,落实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打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养老、异地居住的社保衔接通道,保障流动老年群体权益。同时,严格执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由省级人社部门统筹,结合物价涨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常态化上调待遇,逐步缩小县域间、城乡间养老待遇差距。具体实施路径:① 政策整合:县级民政局牵头,对照省级“养老服务条例”,1年内完成县域涉老政策文件梳理与整合,形成统一的农村养老服务工作清单,避免多部门政策重复、缺位;② 统筹衔接:县社保中心落实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规程,开通线上转移办理通道,针对外出务工返乡老人设立社保衔接专窗;③ 动态调整:严格执行人社部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省级统一部署上调后,县级确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同步对低保、特困老人加发养老补贴。

5.2. 保障升级：依托多支柱理论，构建分层保障体系

借鉴董克用提出的多支柱养老体系改革思路,结合农村实际搭建分层分类的养老保障框架[4]。零支柱(普惠救助):筑牢兜底防线,完善农村特困供养、高龄津贴、失能护理补贴制度,重点保障低收入、孤寡、失能老人;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巩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体地位,出台缴费激励政策,引导农户合理提升缴费档次;第二、三支柱(补充养老):推动适配农村的商业养老保险、个人养老产品下沉,发展小额养老储蓄、集体补充养老;第四支柱(非正式保障):激活家庭、社区、邻里的互助功能,将传统养老模式与现代服务相结合,形成多支柱协同发力的完整保障格局。具体实施路径:零支柱:县民政局建立低收入、失能、孤寡老人动态摸排机制,高龄津贴、护理补贴按月社会化发放;乡镇将养老救助与低保审批并联办理,缩短办理时限;第一支柱:落实省级统一的阶梯缴费补贴政策,对选择年缴费2000元及以上档次的参保人员,按不低于缴费额10%的标准增加政府补贴,具体标准执行省级统一规定;二、三支柱:配合银保监部门推进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县域覆盖,鼓励村集体为村民集体投保补充养老险;依托农商行、邮储银行网点推广个人养老金与养老储蓄产品;第四支柱:按照民政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规范,由村委会建立互助养老台账,登记低龄老人服务时长,实行“时间银行”兑换机制,兑换内容包括日

²https://www.gov.cn/guoqing/2021-10/29/content_5647622.htm

间照料、助餐、助洁等基础服务。

5.3. 资金多元：拓宽渠道，构建混合筹资机制

按照福利多元主义与多元化筹资思路，改变农村养老过度依赖财政的现状[8]。一是激活村集体筹资能力，依法从集体土地流转收益、经营性收入中按比例提取公益金，专项用于村级养老服务。二是落实养老服务税费减免、用地保障等优惠政策，降低运营成本，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养老设施运营。三是规范养老资金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保障长效运转。四方权责与运营模式(基于公建民营成熟试点，非自创)：① 政府(县级民政、财政部门)：提供村级闲置校舍、集体建设用地等场地资源，按规定给予床位运营补贴、建设补贴，落实税费减免政策，负责服务质量监管与绩效考核；② 村集体：从集体经营性收益中提取 10% 左右设立村级养老公益金，用于补贴本村老人服务费用、补充设施运维；以场地入股合作项目，优先保障本村老人低价享受服务；③ 社会资本(运营方)：承担设施改造、人员招聘、日常运营管理，提供专业养老服务，按约定获取合理收益；④ 个人：老人按标准缴纳基础服务费用，特困、低保老人由政府补贴与村集体公益金兜底减免。

5.4. 服务完善：深耕医养结合，补齐服务短板

立足医养结合政策发展经验，破解农村医养分离难题[8]。推动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与社区养老站点、敬老院深度合作，推行签约服务、上门问诊、慢病管理等模式，打通“养老 + 医疗”服务链条。结合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大力推广“低龄助高龄”邻里互助、日间照料中心等本土化养老模式，降低运营成本。具体实施路径：① 村医养老签约机制：乡镇卫生院牵头，村卫生室与村级养老服务站签订医养合作协议，每周 2 次上门慢病随访、季度免费体检；对失能老人提供每月 4 次上门护理；② 微型医养站点建设：财政专项资金为中心村养老站增设康复床位，配备简易理疗器械，乡镇卫生院派驻医护人员每周驻点 2 天；③ 本土化互助养老：村委会组织 60~70 岁低龄老人组建志愿服务队，每人每月提供不少于 8 小时照料服务，存入时间银行，年老后兑换同等时长照护。

5.5. 文化赋能：传承孝文化，稳固家庭养老根基

依托传统孝道文化重塑乡村养老氛围，夯实家庭养老这一基础模式[3]。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开展孝老爱亲文明评选、乡村主题宣讲等方式，传承敬老传统，强化子女赡养责任。配套落实赡养专项个税抵扣、家庭照护“喘息服务”、探亲休假等惠民政策，减轻家庭照护压力。依托乡村文化礼堂、老年协会、乡村学堂等阵地，开展文体活动、老年教育，丰富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实现物质保障与精神关爱同步推进。具体实施路径：① 孝文化引导：将孝老爱亲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村级定期开展“孝老之星”评选，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敬老主题宣讲；② 家庭照护支持：落实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重度失能老人家庭，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每年一定时长的免费喘息服务，缓解照护压力；③ 精神文化服务：依托村文化礼堂、老年协会，定期开展老年文体活动与健康知识讲座，开设老年智能技术培训，提升老人数字素养与生活质量。

6. 结论与研究展望

6.1. 研究结论

综合全文分析，在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乡村空心化多重趋势叠加下，我国农村老龄化呈现规模庞大、增速加快、空巢化突出、群体弱势集中、区域失衡、未富先老六大典型特征。受城乡二元体制、多元主体缺位、传统养老文化弱化、农村经济薄弱四大深层因素制约，当前农村养老在制度建设、经济保障、养老模式、服务供给四大领域陷入系统性困境。

本文结合多支柱理论、福利多元主义以及国内既有研究成果,提出制度统筹、保障升级、多元筹资、服务提质、文化赋能五位一体的优化路径。五大路径相互衔接、协同发力,既立足农村乡土实际,又贴合国家养老改革方向,能够逐步化解现存矛盾,推动农村养老事业走向可持续发展。

6.2. 研究展望

结合曹献雨对国内养老领域整体研究趋势的研判[5],未来农村养老的研究与实践可向多个方向深化:第一,开展区域差异化研究,针对东部劳务输出村、西部欠发达乡村、山区村落等不同类型制定精准养老方案;第二,推进跨学科融合,探索智慧养老、数字化服务在农村的落地场景,破解农村“数字养老”难题;第三,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农村的试点与全面推广,补齐失能老人专项保障短板;第四,强化基层田野调研,立足农村老年人真实需求,推动养老政策从宏观普惠向微观精准转型。

参考文献

- [1] 陆杰华, 郭芳慈, 陈继华, 等. 新时代农村养老制度设计: 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4): 113-122.
- [2] 杨清哲.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 [3] 郭庆旺, 贾俊雪, 赵志耘. 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J]. 经济研究, 2007(8): 58-72.
- [4] 董克用, 孙博. 从多层次到多支柱: 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再思考[J]. 公共管理学报, 2011, 8(1): 1-9+122.
- [5] 曹献雨, 等.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问题研究趋势分析[J]. 经济与管理, 2018, 32(6): 25-30.
- [6] 汪伟.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变革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J]. 金融研究, 2012(10): 29-45.
- [7] 张艳霞, 刘远冬, 吴佳宝, 等.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资金供给现状及多元化探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4): 78-90.
- [8] 尹艳红. 我国医养结合政策演进及其优化[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 40(7): 102-112.